

學習江澤民深謀遠慮 實現香港由治及興

議事論事

韓成科

紀念江澤民同志誕辰100周年大會昨日在京隆重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大會並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主席表示，江澤民同志領導實現香港、澳門順利回歸，推動兩岸雙方達成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有力開展反分裂、反「台獨」重大鬥爭；我們要學習江澤民同志深謀遠慮的戰略思維。江澤民同志目光遠大、審時度勢，善於從中國和世界發展大勢、從黨和國家工作全局出發觀察和思考問題，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來的重大決策、重要舉措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展。

始終堅持「以我為主」策略

江澤民的深謀遠慮，可以體現在「後過渡期」與英方的政治博弈和較量，最終成功領導實現香港順利回歸上面。「末代港督」彭定康在1992年單方面推出所謂「政治制度改革方案」，試圖在香港回歸後延續英國對港的影響力，為外部勢力插手香

港事務留下後門。面對英國違反《中英聯合聲明》，違反與基本法相銜接的原則，違反中英之間的諒解和協議的「三違反」方案，中方堅定底線，明確反對。

1992年底，中方提出「以我為主、兩手準備」方針，加緊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並籌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有關工作。江澤民在會見港事顧問時明確表示，「不管出現任何情況，我們都要堅定不移地貫徹『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同時決定另起爐灶，果斷反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預備工作委員會在北京成立。預委會的成立和運轉，不僅給港英當局以有力回擊，迫使英國政府調整了對抗政策，也使中國政府牢牢掌握了香港回歸重大問題上的主動權。

面對英國無所不用其極的阻撓，中方始終堅持「以我為主」策略，英國人在國際政壇縱橫捭闔的政治手腕，面對中國卻接連碰壁，最終確保了香港的順利回歸。1997年6月30日23時42分，舉世矚目的交接儀式開始。7月1日0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奏響，中國國旗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緩緩升起。江澤民在講話中表示，

「此時此刻，世界各國人民都把目光投向香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正式成立。這是中華民族的盛事，也是世界和平與正義事業的勝利。」通過談判解決香港問題，為國際社會提供了一個和平解決國家之間歷史遺留問題的範例。這正是深謀遠慮戰略思維的鮮明展現。

值得指出的是，當年曾有人醞釀出資十億英鎊，希望在1997年後繼續租借香港。面對這種試探，江澤民的態度堅決並表示「不要說十億，就是一百億、一千億，我也不會出賣香港，我絕不做第二個李鴻章。」撫今追昔，沒有江澤民等領導人的雄才大略，深謀遠慮，香港的回歸將不可能如此順暢。

如何學習江澤民深謀遠慮的戰略思維？習主席在重要講話引述江澤民強調，「全黨同志一定要用馬克思主義的寬廣眼界觀察世界。所謂寬廣的眼界，一是要有歷史的深遠眼光，一是要有世界的全局眼光。」「要正確認識我國社會和當今世界發生的重大變化，正確認識廣大黨員、幹部和人民群眾工作生活條件和社會環境發生的重大變化，正確認識這些變化對我們黨和國

家事業發展提出的新任務、新課題、新挑戰，加強對全局性、戰略性、前瞻性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的研究。」這個方法論對香港同樣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從國家看香港 從香港看世界

香港當前正編制首份五年規劃，這不單是香港重要的發展藍圖，更體現治理模式的轉移，要求更重視全局性、戰略性、前瞻性的規劃。香港要實現高質量發展，要更好應對內外風險，更須不斷提升戰略思維，不只從香港看香港，更要從國家看香港，從香港看世界，正確認識香港的新任務、新課題、新挑戰，以規劃思維、戰略思維更好地服務國家戰略部署。學習江澤民的深謀遠慮，強調的是堅定的政治立場，善於審時度勢，寬嚴相濟，始終堅持改革，始終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

江澤民真摯深厚的為民情懷，同樣令人感懷，特別是對香港的支持和關顧，令人觸動。在1997年到2002年的五年間，江澤民四次親臨香港，時刻關注着香港每一步的發展變化，深切惦記着普通香港市民的生活。對於香港的發展和特區政府的

工作，江澤民給予高度評價，他曾講過：事實充分證明，「一國兩制」是完全行得通的，特別行政區政府是具有駕馭複雜局勢的智慧和能力的，香港人是完全能治理好香港的。

江澤民對香港的信心，既在於對「一國兩制」優越性的深刻認識，更在於對特區政府、對港人的高度信任，始終堅信在中央的支持和港人奮鬥下，香港人一定可以治理好香港。這種穿透歷史的深邃目光，對港人的信任和支持，至今仍然令人崇敬不已。

習主席在重要講話中引用了江澤民「歷盡天華成此景，人間萬事出艱辛」的詩句，勉勵全國人民要堅定信心、奮發圖強，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而不懈奮鬥，不斷創造中國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書寫中華民族更加壯麗的華章！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香港是參與者也是受惠者，在今日重溫江澤民的智慧和寶貴經驗，領悟其戰略思維，對於推進香港由治及興，開創新發展篇章，都有重要的指引作用。

香港文化協進智庫高級副總裁、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不止一晚，不限一地 票尾經濟從啟德走向全城的突圍之路

議事廳

陳克勤

啟德體育園早前舉行的「香港足球盛會2026」與「奧迪夏季巡迴賽」，三場球賽共吸引逾12萬人次入場，門票收入預計超過1.8億港元。據政府統計，今年上半年逾130項盛事吸引約175萬旅客參與，帶來約58億港元消費額，經濟增加價值約為33億港元；下半年亦將舉辦100項盛事活動，吸引超185萬旅客參與。

「票尾經濟」能夠將人流轉化為經濟效益輻射周邊。據統計，近期多場盛事帶動九龍城區內商戶生意額上升約15%，當中單是「票尾經濟」帶來的生意額已佔5%至8%。這一方面得益於商戶積極響應，啟德、九龍城均有40個商家參與票尾優惠計劃，使得觀眾可以憑藉活動門票，在餐飲、停車、零售、住宿等方面獲得優惠；同時也得益於政府政策支持，旅發局牽頭推出「活動門票消費優惠」，旅客及市民憑指定盛事門票可享全港逾100項酒店及旅遊景點的額外95折優惠，力爭將人流擴散至更多商家、景點。

然而，該模式仍然存在一定提升空間。首先，空間上主要集中在九龍城，且缺乏整合，呈現零散分布；時間上也較短，大多觀眾僅會在活動當晚停留消費，未能發展成深度遊；而行業上也主要集中在餐飲零售方面，未發揮整體效應。因此，未來可以從這三方面着手進行改善：

一、打破交通壁壘，從點到線擴展票尾經濟空間範圍

便利的交通接駁能夠降低出行的時間成本，串聯不同的旅遊景點，實現從點到線的轉化。盛事期間可視情況增設啟德直達九龍城、土瓜灣、深水埗等社區的穿梭巴士，並調整巴士路線為旅遊專線，主要

路過商業區、合作食肆、旅遊區等，亦可於車上提供電子優惠提示，降低遊客決策成本。此外，可在場館周圍增加前往有關地區的路線提示與景點、合作商戶介紹，便利遊客出行。

二、搭建統一票務平台，從線到面整合有關文旅資源

統一的票務能夠整合食、住、行、遊、購各環節，方便遊客一站式獲取全港優惠資訊，實現從線到面的轉化。內地有不少城市曾經推出過「演唱會門票＋文旅」的模式，於微信小程序中整合住宿、餐飲、景區、交通及購物優惠，該模式累積吸引百萬名用戶，帶動近2.7億元人民幣消費。而香港亦可以參考打造這樣的平台，整合不同旅遊線路，打造「票尾經濟＋香港深度遊」的旅遊模式。

三、發揮長尾效應，延長票尾經濟影響時間

可以通過票尾經濟，將吸引遊客變為留住遊客，發揮其長尾效應。一方面可以延長票尾經濟的有效期，比如延長票尾有效期至賽事前後一個月甚至幾個月，吸引遊客留港遊玩或再次來港。更重要的是，要在活動設計之初便規劃「活動後半場」，將比賽同音樂會、粉絲見面會、夜間市集、博物館展覽等進行聯動，讓門票變成一份「節目表」而非一張入場券；而遊客在兩次活動的間隙自然也會產生消費，從而帶動遊客從單次打卡轉變為多次留港深度遊。

從一場球賽到全港盛事，從活動當晚到貫穿始終——票尾經濟的潛力遠不止於此。香港擁有景點集中、交通便利的天然優勢，通過點、線、面的結合，票尾經濟完全有條件從區域性的短期紅利，升級為全港性的長效經濟動能。

民建聯主席、立法會議員

五年規劃是有目標、路線、考核的行動綱領

議論風生

林順潮

特區政府編制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是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推動自身經濟轉型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契機。站在新的發展階段，香港需要在鞏固金融、貿易、專業服務等傳統優勢的同時，正面回應人口結構、產業轉型、科技革命及區域融合帶來的深刻變化，提前部署新的增長動能和公共服務模式。首個五年規劃的意義，在於把不同領域的發展目標納入一套中長期框架，釐清政策優先次序，形成一份有目標、有路線、有考核的行動綱領。

更值得重視的是，支撐香港過去數十年發展的一些基本條件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低生育率、平均壽命上升與勞動人口結構調整同步出現，醫療、安老及社會福利需求持續增加；土地供求、房地產市場及政府收入結構亦進入新的調整期，傳統物流、零售等行業面對轉型壓力。與此同時，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正在重塑服務業和就業市場。這些變化彼此牽動，人口、產業、財政與民生之間的關係比以往更加緊密。香港未來五年的發展，不能只沿着過往的增長路徑向前推進，而要因應新的發展條件，重新校準資源配置和政策優先次序，為更長遠的轉型預留空間。

被動適應轉向主動規劃

另一個正在加快形成的趨勢，是香港與內地尤其大灣區內地九市的生活圈、服務圈日益融合。北上消費、

跨境就醫、跨境安老，以至跨境居住和工作，正逐步成為不少市民的日常選擇。這些變化會重新塑造香港的消費、醫療、安老和公共服務需求，同時亦為香港拓展發展腹地、善用大灣區資源創造新的條件。香港需要由被動適應轉向主動規劃，透過制度銜接、標準互認、數據互通和公共服務協作，把人口流動和生活方式的轉變，轉化為大灣區資源互補和香港長遠發展的新空間。

因此，首個五年規劃可以視為香港對自身發展模式的一次系統梳理和重新定位。哪些傳統優勢需要進一步鞏固，哪些產業要加快培育，哪些制度需要改革，哪些民生問題必須提前部署，都應有更清晰的先後次序。規劃需兼顧當前需要與長遠承載力，為未來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人口結構、產業轉型、公共服務和財政可持續性做好準備，提升香港面對科技革命、區域融合和外部環境變化的韌性。

筆者建議以「發展增動能、改革破難題、民生提質素」為主線。經濟發展方面，應以北部都會區作為新的增長極，按照「政府築巢、全球引鳳、企業成群、龍頭崛起」的思路，完善水、電、路、網、教育、醫療、商業及生活配套，同時面向內地和海外招商，積極爭取中央支持，吸引更多國際及內地科創企業、科研機構、資本和人才落戶香港。北都的成功，土地和樓宇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要能否形成具規模效應的產業集群，培育出代表香港的龍頭科創企業、重磅新藥和明星科技產品。

創新科技方面，香港的核心短板

不是科研能力不足，而是成果轉化和產業承接不足。未來應打通由基礎研究、概念驗證、中試、產業化到市場應用的完整鏈條，開放更多公共應用場景，並深化深港及大灣區在人才、資金、數據、設備和臨床研究方面的協作，形成香港科研及國際接口與大灣區產業、市場優勢相互結合的創新體系。

設定KPI定期檢視成效

民生方面，要把人口老化、青年就業、住屋及貧富問題放在與經濟增長同等重要的位置。醫療及安老應加快跨境制度銜接，完善醫療券、醫健通、跨境康養及基層預防體系；青年政策應主動應對AI帶來的就業結構變化，加強「AI＋專業」人才培養和大灣區就業創業支援；房屋政策應重點推動「租轉買」，把部分公屋租金轉化為置業儲蓄，協助公屋居民逐步走向置業，打通由租住公屋到資助置業的上流階梯；扶貧政策則應更加精準，由被動補貼逐步轉向主動識別、分類支援和就業賦能。

首個五年規劃最重要的是由「有方向」走向「有結果」。建議各主要政策範疇設定清晰的年度目標和關鍵績效指標（KPI），定期檢視北都產業發展、科研成果轉化、青年就業、公屋「租轉買」、醫療服務及扶貧成效。只有把目標、責任、時間表和成效評估真正連接起來，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才能成為一份「精而美」、有香港特色、以民為本、以結果為導向的行動綱領。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浦東開發可為北都建設提供鏡鑒

有話要說

陳成爐

香港當前正全速推動北部都會區建設，不禁令人聯想到上海浦東的開發。兩者都是在經濟發展遭遇瓶頸時，進行城市新布局。浦東經過30多年的開發，2025年地區生產總值近1.88萬億元，約佔上海全市三分之一，成為中國、乃至全球新區開發的典範。

今日香港，面對的是另一種「增長焦慮」：傳統優勢產業天花板顯現，而北部約佔香港全域三分之一的300平方公里，長期處於「南熱北冷」的失衡格局中，農地、棕地與村落散落其間，與一河之隔的深圳繁華形成鮮明對照。香港如何像當年浦東那樣，以一次城市新布局，為都市打開新的發展縱深，其間浦東哪些經驗可供香港借鑒？

浦東開發最根本的空間智慧，不在於「造了一座新城」，而在於改寫了城市的幾何結構。它把黃浦江從阻隔城市的「障礙」轉化為串聯兩岸的「內河」，讓上海從「浦西單岸」躍升為「跨江雙城」。這

是一種城市軸心的戰略性平移。

北都的使命與此神似：讓香港從「維港都會區」的單極牽引，走向「維港＋北都」的雙引擎格局。不過北都的空間邏輯需要更為極致——它還需要繼續「向北」，需要面對一條承載了半個多世紀政治想像的邊界線。北都的真正考驗，不在於「閉門造城」，而在於能否把深圳河從「邊境」轉化為「走廊」，把多個陸路口岸從「過關開口」向「綜合廣場／樞紐」轉型。

與維港並置的「第二極」

浦東早期曾被定位為「疏解浦西擁擠」的空間——工業東遷、人口東移。但真正讓它崛起的，是另一條邏輯：生成浦西沒有的新功能。陸家嘴的金融交易、張江的生物醫藥、金橋的先進製造，都是「增量」而非「存量轉移」。浦東教會我們的是「功能原創力」：新區不是舊區的影子，而是城市的另一副面孔。

浦東當年「跨江」的勇氣，首先得益於銳意改革，務實探索。城市新布局的成

功，從來不取決於「新區的面積」，而取決於「舊軸與新軸的關係」。只有當北都成為與維港並置的「第二極」，承擔中環無法承擔的新型功能，這次布局才算真正完成。所以，北都的獨特價值，在於生成一種中環和深圳都難以單獨孕育的「接口型功能」——跨境數據的治理實驗區、國際科研機構的雙總部模式等，北都甚至可以探索更優化高效的專屬管理體制，充當制度創新的「沙盒」。

浦東開發依託的是內地特有的垂直高效的行政統籌與土地批租模式。香港無法、也不必複製這套機制——不僅因為制度土壤不同，更因為香港擁有浦東求之不得的獨特稟賦，關鍵在於如何激活。須知真正的借鑒，從來不是模仿——而是在他人的鏡子裏，照見自己獨一無二的面孔。

首先是「一國兩制」帶來的各種獨特優勢需要激活。香港的法制體系，對合約精神嚴格遵循，在國際投資者眼中具有天然的信任溢價。北都建設應主動用它降低交易成本——讓國際資本和技術相信，在

這片土地上簽訂的協議、合約，擁有可預期的法律保障。浦東當年吸引外資靠政策優惠，北都可憑的是法治的確定性，後者在今天更具持久吸引力。

其次是國際連通性與「超級聯繫人」的樞紐價值。自由港、獨立的貨幣體系、低稅率、信息自由流動——這些都是北都的核心競爭力。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的獨特性，正在於它可同時兼容內地科研資源與國際技術交易規則。

第三是專業服務體系的深厚積蘊。國際仲裁、跨境法律諮詢、離岸人民幣結算、高端保險與再保險——中環沉澱了幾十年的「軟基建」，恰恰是新區開發中最易被低估的支撐系統。北都不必從頭搭建融資與風控能力，完全可以將金融中心的專業網絡「平移」到建設過程中，讓開發本身成為金融創新的試驗場景。

實現跨界跨區域融合

最後是社會參與和制度透明帶來的長期穩定性。香港的公眾諮詢、環評程序、立法會審議，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拉長了決

策周期，但也為北都的發展紅線提供了社會共識的錨定——當一片土地經過充分討論被開發建設，它的功能定位、生態底限、社區權益便具有了更強的抗反覆性。這種確定性，同樣是企業和市民樂見，也是北都開發的優勢條件。

浦東30多年走完西方城市百年的路，是「壓縮式現代化」的標本。而北都的真正命題，不是「如何在效率上追趕浦東」，而是如何用好浦東無法複製的制度稟賦與獨特優勢，走出一條屬於香港的、不可替代的開發建設路徑。

浦東和北都，都是一個城市「重新想像並創新打造自己」的載體。浦東用30多年證明了一座新城可以「長得快」，北都的未來則取決於它能否回答另一個問題——一個高度成熟、土地緊束的國際大都市，如何通過結構轉型，跨界跨區域融合，實現「舊核心」向「港深雙城三圈」乃至輻射整個大灣區新格局的可持續蝶變與高質量發展。

江西省政協委員、江西省旅港同鄉會會長